

古典文学参考資料

(第一輯第二分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研組选輯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284714

爱国詞人辛稼軒

邓广铭

一 一个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斗士

辛稼軒（名棄疾、字幼安）所屬的时代，就是說，他从事于各种社会活动和斗争、从事于文学歌詞創作活动的时代，也就是反映在他的文章詩詞各种作品当中的时代，是从一一六一到一二〇七这四十六年。

在这一时代断限之内，統治着淮水以北的广大华北地区的金国，其实力虽已日渐衰頹下去，对华北人民殘暴的奴役和压榨却不但是丝毫没有放松，反而在随时加紧，对于积貧积弱、腐朽無能的南宋政权也依然是一个極大的威胁。因而貫通于上述的四十六年这一整个时期的主要历史課題，和它的稍前与稍后的几十年內的問題并不兩样，是南方的汉族人民与其文化如何得免于女真鉄騎的蹂躪摧殘乃至毀灭，以及广大北方的汉族人民如何从女真侵略者殘暴的奴役压榨之下解脫出来的問題。所以，实际上做为这一特定时代的起訖標誌的，就不但是辛稼軒个人的参加社会斗争及其死亡的事件，并且还有一一六一年金人所發动而最后招致了自身潰敗后果的金主亮的伐宋之役，和一二〇六、〇七兩年宋方所發动而也最后招致了自身潰敗后果的韓侂冑的伐金之役。而在这兩次战役、以及介居于这两次战役之間的宋金兩國間的其他斗争，辛稼軒無一次不是很奋勇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当中，为保衛汉族人民生活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貢獻出他的智能和力量的。

当一一六一年金主亮在华北大量地征兵征餉，进行着对南宋的軍事侵略时候，一个名叫耿京的济南农民，奋起壟亩，号召起义反金，不久就聚攏了二十万以上的劳动人民，活动于泰山周圍的山区当中，成为当时山东河北各地起义軍中声势最为雄壯的一枝。这时

候，一般出身于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們却还在彷徨顧望，不肯參加到起義軍中去受這一個出身于農民的耿京的領導^①。辛稼軒，一個也是生長在濟南的剛滿二十一歲的年輕人，却起而糾合了兩千多人，首先投歸于耿京的旗幟之下，擔任了起義軍的書記，並且代表耿京到建康去與宋高宗接洽雙方軍事上的配合行動諸事。及至北返復命，中途却得到消息：耿京已被其部下叛徒張安國所殺。這時金國為要瓦解各地的起義軍，正下了一道命令說：“在山者為盜賊，下山者為良民。”^②因而在張安國叛變之後，起義軍大部潰散，未潰散的一部分便被張安國劫持着投降金方了。辛稼軒在偵悉張安國的所在之後，即組織了五十名騎士，由他率領着，直趨金營，于五萬人眾中提出叛徒張安國而縛置馬上，當場又號召了上萬的士兵起而反正，跟同他不分晝夜地向南急馳，渴不飲，飢不食，一直奔馳到淮西地方才得休止^③。

辛稼軒的南歸，主要的不是要求自身逃出于女真侵略者的壓迫奴役，而是要把他所認識到的金國內部所存在的矛盾、弱點，以及他在行軍用兵方面所已具有的一些智能和謀略，一齊貢獻出來，加強南宋統治集團對於戰爭的信念，喚起並且提高他們的戰鬥情緒。不幸的是，一一六三年由張浚所發動的對金國的攻勢在符離地方被金兵打得大敗，接着便是主和派的人物和議論在南宋政府中抬了頭，主戰派的張浚等人先後被排斥出去。辛稼軒在這時候不顧自身官職如何低微，却挺身出而獨抒所見，就宋金的對立和戰爭的前途加以具體的分析，寫成論文十篇，統名之為“美芹十論”，于一一六五年呈獻給宋孝宗。在論文前面的序引當中，他首先把秦檜主和以來幾十年內在士氣民心方面所起的摧抑銷鑠的壞作用及其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取來與張浚的符離之敗所給予南宋的損失兩相比較，以為后者遠不及前者之酷烈。以為“符離之師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却終還表現出一些“生氣”，因而萬不可為了此一戰役的小小挫敗而即改變或放棄了恢復的大計。這番議論，不但為當時主和派人所不敢說，即當時主戰派的人物也同樣不敢如此明確地作出判斷的。這就充分表明了，不論在如何困難的局勢之下，辛稼軒對於抗金鬥爭的

胜利信念是絲毫也不会动摇的。

論文的前三篇，詳細地分析了金国内部汉族人民对女真統治者的憎惡、怨恨和仇視情緒之日益深化与激化，以及其最高統治階層中人相互間的齟齬、猜忌和自相殘杀的混乱事实。論文的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应如何積極从事于作战的准备，以便能够抓紧时机完成恢复大計等事，也都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划，并随处对南宋軍政当局給以鼓舞，希望能把他們拔出于消沉畏縮的气氛当中，把勇气振作起来。

在辛稼軒呈奏这十篇論文的三数年后，虞允文进入政府作了宰相。虞允文是——六一年曾在采石打败过金主亮的軍隊的人，在其时的高級官僚当中，他也比較有朝气，敢作为。辛稼軒遂又另写了“九議”献給虞允文。这九篇論文的内容，除包括了“美芹十論”当中的一些重要論点而外，他更明确地指出：（一）打击金人，恢复国土，是为国家、为生民的一件巨大工作，决不是属于皇帝和宰相的一件私事，因而他們也不应当只是为了私人的利害而避开这一任务。（二）为爭取整个战争的胜利，必須能够經受得起某一战役的挫敗。（三）士大夫間所存在的东南地薄兵脆、不足以爭衡于中原的成見，是必須清除糾正的，刘邦、項羽以吳楚子弟而北上灭掉了暴秦，就正足以粉碎这一錯誤論点。

不論是十論或九議，不論在宋孝宗或虞允文那里，都沒有受到应有的重視。然而，到这些文章逐漸傳布开去之后，由于其中的规划和議論之“英偉磊落”^①，却終於把一些希望、信心和力量給予了具有民族意識的真正的中国人民，鼓舞了他們的战斗精神。而这一社会人羣从此也都把辛稼軒認作是一个結合了多方面的智略和才干的豪傑人物。——剛滿了三十岁的辛稼軒，不但早已“以气节自負，以功業自許”^②而当时所有爱国志士們对辛稼軒也都已怀着这样的期待了。

然而，不論金国内部矛盾的爆發多少次給予南宋以可乘之机，不論华北劳动人民怎样在企望着南宋方面能以軍事力量把他們从水深火热的处境中解救出来，自然更不論辛稼軒和其他爱国志士們如

何在等待着有一个效命于民族斗争战线上的机会，南宋的最高统治阶层却总是不敢把抗金的斗争任务列置在他们的日程之上，不敢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引导到反抗侵略的斗争上去。因此，不但在投归南宋的最初几年，辛稼轩只是浮沉于下级僚吏之中，即在他的智略和才干已经有了一些表现，已经被社会人羣認識出是一个英雄人物时，也还只是在江西和湖北、湖南等地区作了几任地方上的军民或财赋行政长官。而从一一八二年到一二〇三年，除了中间曾一度出任福建提刑和安撫史共不足三个年头外，在整整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之内，他是完全被南宋政府棄置不用的。

一二〇三年，是宋宁宗的第八年，也是韓侂胄当权的第八年，辛稼轩在这年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韓侂胄为要提高自身在统治阶层中的威望，要起用一些负有时誉的人物，要发动对金国的攻势，要建立一番功业。在这年夏天，曾经被韓侂胄及其党羽大力排斥过的辛稼轩，又被起用为浙江东路的安撫史，第二年春初被召见，接着又改命为鎮江知府了。

这时候的辛稼轩，已经是一个誉望很高的人，故当他被召见的时候，爱国诗人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送他，把他和管仲、蕭何相比，希望他不要介意过去受排斥、不得志的事情，而要勇往直前，把克复中原的事业担当起来^①。当他去到鎮江上任之日，鎮江的学者刘宰也在欢迎他的信中把他比作張良和諸葛亮，而且說道：“敢因画戟之来，遂賀輿圖之复。”^②而辛稼轩在受到起用詔命之后，也确实“不以久閒为念，不以家事为怀，風采凜然，單車就道”^③，是要挺身把这一现实任务担当起来的。

辛稼轩在这时候，一方面很明确地断言金国之必乱必亡，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南宋还并没有具备对金用兵制胜的条件。他以为不应当像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年中对拓跋魏的军事那样，不精确估计一下双方实力的对比，而即草草盲目进取，那反而是只会“赢得倉皇北顧”的^④因而他向宋宁宗和韓侂胄强调提出应当大力从事于准备工作，应当把对金用兵的事委託給元老重臣，“务为倉猝可以应变之計”。而这所謂“元老重臣”，事实上他也是“当仁不让”地把自

已包括在內的。所以他到鎮江上任之后，立即亲自佈置了一些与准备开战有关的事項：首先是派遣一些間諜到金国去偵察其兵馬數目、屯戍地点、將帥姓名、帑廩位置等，又做好一万套軍裝，要在沿边各地招募一些土丁以应敌^①。

韓侂胄和他所引进到政府中的，大都是属于執袴之羣，他們和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貫、王黼等是同一流的人物。在对金作战的主張既已取得社会輿論的贊同和支持之后，他們遂以为这是極易建立的勳業，是垂手可得的功名，竟不願意再假手別人，于是，辛稼軒做鎮江知府还不滿十五个月，一切設施还没有安排妥当，却被韓党加上“好色貪財”的罪名而把他罢免，一个老而益壯、生气勃勃如虎，而且自願献身于抗敌火綫上的辛稼軒^②，只得再回到鉛山去过田园生活了。

一二〇六年夏，韓侂胄以郭俸皇甫斌率师伐金，各路都被金人打得大敗。用謝枋得“祭辛稼軒墓記”中的話，“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讐不复，大耻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而在一二〇七年的八月，辛稼軒就實志以歿了。

二 一个有良心、有才干的地方官

辛稼軒从一一七二年起始，直到他的去世，除掉賦閒家居的二十几年之外，其被南宋政府所委派的职务，絕大多数是作地方上的長吏。尽管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眼中从始到終都替辛稼軒感到“委屈”，認為是“大材小用”^③，然而凡是辛稼軒仕履所及之地，不論为时久暫，却大都是在地方事業上有一番兴建的。

由于他出生于华北平原，对于北方农村中經濟生活情况，是十分熟悉的。当时南方商業資本的發展，其在社会經濟上的比重和作用，是远非北方所能比拟的，而其最显著的結果，一方面是商人之兼併农民和农民之流亡失業，另一方面則是很多农民不願再致力于农田而要轉業为商販。辛稼軒南归之后，立即体認出南北社会經濟方面这一巨大差異，依照他的認識是：商業的繁荣虽有必要，但必須把商業限制在不至“病农”的程度之內；土地兼併之禍不但应当防

止，而且政府还，应当尽力使农民能具备从事耕稼的条件。他强调主張：“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并自名为“稼軒”，表示对于农事和农民的極端重視。就辛稼軒在各地方的政治实践来看，也都的确体现了他的这项主張的。

一一七二年辛稼軒被派作滁州的知州。由于滁州地僻且瘠，在屢經兵燹災荒之后，城郭已蕩然为墟，人民則編茅結葦而寄居于瓦礫之場。辛稼軒到任之后，首先免除了农民們前此所欠交的一切稅款，并又減輕了新稅的数目，放寬了征收的限期，以使农民能安心尽力于墾亩。又在州城之內兴筑了一些邸店旅舍，以便利商賈，振兴商業。在这一連串的措施之下，流亡的农民大量地返回到本乡本業了；商販畢集，閭閻之間也呈現出繁荣景象了；“人情乐生兴事，荒陋之气一洗而空”了^④。

一一七五年，以賴文政为首的几百名販賣私茶商人武裝起事，流轉于湖南江西地区，南宋政府用辛稼軒为江西提刑，帶兵去平定了这次的起事，把賴文政擒获杀掉了。因为販茶私商起事的性質与作用如何，还需要深入研究，所以解决茶商軍一事是否应算作辛稼軒的罪行，以及这一罪行之輕重大小程度如何，現在都还不能論定，但有一事却是極其明白的，那就是辛稼軒在用兵过程当中，只是以“撫定”为主要手段，而并不是采用屠殺手段的；其最終的目的，也是要使茶商軍所經行的十来个州郡能再得从事于农桑之業^⑤。

辛稼軒之能够比較正确地了解农民問題，能够比較正确地認識当时农民起义的原因，就其在一一七九年呈獻給宋孝宗的一封奏疏中是可以明确看出的。奏疏中首先叙述了四五年来相連不断地發生于湖湘地区的几次农民起义，繼即对农民起义的原因加以分析道^⑥：

“陛下不許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許將百姓租米折納見錢，今有一石折納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橫歛可知。

陛下不許科罰人戶錢貫，今則有旬日之間追二三千戶而科罰者；又有已納足租稅而復科納者，有已納足、復納足、又誣以違限而科罰者。

有違法科賣醋錢、寫狀紙、由子、戶帖之屬，其錢不可勝計者。

軍兴之际，又有非軍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而科錢，每都保至數百千者；

有以賤价抑买、貴价抑賣百姓之物，使之破蕩家業、自縊而死者；

有二三月便催夏稅錢者。其他暴征苛歛不可勝數。

然此特官府之弊爾。流弊之極尤有甚者：

州以趣辦財賦為急，縣有殘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問；

縣以并緣科歛為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

吏以乞取貨賂為急，豪民大姓有殘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問。

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大姓以兼併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掠奪害之，……不去為‘盜’，將安之乎？……

民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為‘盜’，今年剿除，明年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臣不勝憂國之心，實有私憂過計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也。”

根据这一段話，我們可以斷定：辛稼軒虽是南宋統治階級中之一員，而却肯挺身出來代替呻吟於統治集團和剝削階級苛重壓榨下的勞動人民說話，且簡直是代替廣大人民對統治集團和剝削階級提出控訴，這是當時統治階級中任何其他的人員所不能做到的。

在上一奏疏呈獻之後，辛稼軒被任為湖南路的安撫使兼潭州（長沙）的知州。其時湖南正鬧災荒，他下令給本路各州郡，動用官存米谷，募工濬筑陂塘，以資賑濟。用意是：一則借此可使官米真正為貧苦的勞動人民所食用，二則興修陂塘成功也更能有利於農作。到一一八一年他又改任江西路的安撫使兼隆興府（南昌）的知府，其時江西路各地又正遭逢嚴重旱災，他到任之初便在各地大街上張貼出八個大字的佈告：“劫禾者斬，閉糶者配。”^⑩前一句是限制缺糧的貧民不至去強割未成熟的五谷，後一句則是強制積米之家必須把存糧糶賣出來。這一措施，不但在當時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到明清兩代也一直還是把它作為救荒史上的佳話。

辛稼軒對農民疾苦的這種關懷，積極要求為農民興利除害的作風和行徑，也和他對於祖國的熱愛相同，是一直繼續到他的晚年而未或稍異的。即如在他六十四歲被起廢為浙江東路的安撫使時，他到任之後即又向宋寧宗奏陳本路害農最甚的六件事，請求明令加以罷除，并着各路長官和朝廷上的監察人員普遍糾察，凡是州縣官中犯有此类害民罪行的即予彈劾罷免。其所舉六事之一，便是“輸納歲計有余，又為折變，高估趣納，以飽私囊”的事^⑪。

上述的一些事例，不但都足以說明辛稼軒才具的卓越和識見的通达，而更重要的是還都足以說明辛稼軒是曾推行了一系列的惠民的實政的人，是一個對當時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願望不但關切而且具有較深了解的人，而這樣的一個地方長官，毫無疑義，是當時當地的人民大眾所歡迎、所愛戴的。

三 辛稼軒的詞

辛稼軒一生所作歌詞極多，流傳到現今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共有六百二十幾首，而在現存兩宋詞人的作品中，卻還是數量最多的一人。就其作品的形式和內容而論，則其題材之廣闊和體裁之多種多樣：用以抒情，用以詠物，用以記事或說理，有的“穠纖綿密”，有的則又“鏗鏘鼓舞”，這也是兩宋時代其他任何一個詞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擬的。

然而，辛稼軒之所以比較兩宋其他詞人獲得更廣大的聲譽，我們今天之所以肯定辛稼軒在我國文學史上應該佔有崇高的地位，上述諸點還只能算作主要原因之一，其最重要的原因卻還不在這裡。

擺在南宋人民面前的主要時代任務和鬥爭對象，一個是：不但要從野蠻殘暴的落后種族的軍事威脅之下解脫出來，而且更進一步把這一落后種族從北部中國驅逐出去。這一歷史課題，從南宋統治階級的立場看來，也同樣是必要的。而且，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之下，也只有在統治階級能善於把全國的力量加以組織和引導，才有可能把這一任務勝利完成的。另一個是：對於騎在勞動人民頭頂上的封建地主和統治集團的專制主義的兇橫淫威，必須給予一些強有力的反抗和打擊，以使勞動人民自身能稍得喘息的機會。

假如我們承認真正的文藝作家是不會不關心其祖國的前途和命運、不會不關心其同時代人民大眾生活方面的福利和疾苦的話，假如我們承認真正的文學藝術作品必須能夠反映它那時代的主要社會矛盾和主要現實內容的話，那末南宋一代文人們所應加以暴露或揭露、描寫或歌詠的，便只應當以與上述諸問題有關的一些事件為其主題和主體，而不應當是此外的其它任何什麼東西。然而南宋一代

的文人學士們，一部分鑽到“道學”、“理學”的領域中去，雖也揭櫫出什麼“民胞物與”的口號，却把與“民”與“物”最密切相關的一些事全不加以理會，甚至把理財用兵等事也全鄙為俗務，不屑一顧，終日只是玩弄概念，故作玄虛，借口於修身養性、正心誠意，實際上是以此作為逃避現實鬥爭任務的桃花源，並且要把所有讀書人都引領到這方面去；另外的一部分，又只把目光和心力全放在極猥瑣庸俗的個人生活圈子的狹隘囚籠當中，吟風弄月，流連光景，在作品中所觸及所表現的多屬於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次要的乃至完全無關重要的節目，例如良辰美景離愁別恨之類。字句雖或玲瓏剔透，情致却極其頹廢低沉。是只可供清客貴婦人們淺詠低唱、娛情解悶之用的，全然缺乏生命力的一些靡靡之音。雖是寫在漫天烽火的緊張鬥爭時代，從其中卻嗅不出絲毫戰鬥氣氛和煙火氣息。

辛稼軒是當時民族鬥爭戰綫上的一員戰士，是一個始終很奮勇地參加這一火熱鬥爭的人，而平生又“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以這樣的一個人而却借歌詞作為“陶寫之具”，這就顯然用不着証明，他的歌詞必是和那一時代的現實本質有着血肉般的聯系的。而這種與現實本質的密切關聯，就在辛稼軒作品中具體地表現為以下各種特點：

第一，辛稼軒既然對於野蛮殘暴的女真侵略者具有強烈的仇恨感，具有復仇雪恥的決心，因而瀰漫在他的各個時期和各種形式的作品之內的，和當時一般作家的作品中那種頹廢氣氛恰正相反，是一種躍然紙上的壯健奮發的積極進取精神。他以報仇雪恥、整頓乾坤的事業自勉，也經常以此策勵他的朋輩。例如，在滁州登樓远眺，他便觸景生情而作了一首“聲聲慢”以見意：

“今年太平萬里，罷長淮千騎臨秋！”

憑欄望，有東南佳氣，西北神州。”

對於做建康留守的史正志，他鼓勵說：

“袖裡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滿江紅”）

對於做宰相的葉衡，他鼓勵說：

“好卻取山河獻君王，看父子貂蟬，玉京迎駕。”（“洞仙歌”）

对于一个要到汉水流域赴任的人，他策勉說：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

人尽說，君家飞將，旧时英烈：

破敌金城雷貫耳，談兵玉帳冰生燭。

想王郎結髮賦从戎，傳遺業。”（“滿江紅”）

由于送一个赴任汉中的的人，他因而联想到：

“汉中开汉業，問此地，是耶非？

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

而摆在目前的情况却又使他不能不有所感慨：

“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木蘭花慢”）

在郑汝諧被宋孝宗召見时候，他鼓舞說：

“聞道是：君王著意，太平長策。

此老自当兵十万，長安正在天西北。”（“滿江紅”）

对于一个爱国情緒極高而却始終不得其用的陈亮，他更怀着無限同情，特地“賦壯詞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劍，夢回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声。

沙場秋点兵。

馬作的盧飞快，弓如霹靂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

可憐白髮生。”（“破陣子”）

第二，南宋的統治集团中人既不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夢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飄浮在社会上層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玩弄些概念，对于这样的政風和士習，辛稼軒在痛心和憎恨之余，便时常在歌詞中給予一些很潑辣很尖銳的批評和抗議、冷諷和熱潮。例如“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之句，虽其寓意并不十分露骨，却已使得宋孝宗大不高兴^⑧，此外如为韓元吉祝寿而作的“水龙吟”，便極明显地以王衍作为南宋統治集团和社会上層人物的替身而痛加指斥了：

“渡江天馬南來，几人真是經綸手？

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旧！

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眞儒事，君知否？”

一般“騷人墨客”只把一些离愁别恨作为抒写的主题，而整个中华民族所遭遇到的严重灾难和深仇大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却没有佔多少地位，辛稼轩对此也加以指责和质问，說道：

“今古恨，几千般，

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鷓鴣天”）

对于他自身之經常地为南宋政府所棄置不用，以及虽在被用之时也仍是使他不得遂其志、尽其才，辛稼轩也常常在其歌詞当中以諷刺或牢騷語句表示其憤慨。例如：

“綠漲連雲翠拂空，

十分風月處，著衰翁。

垂楊影斷岸西東。

君恩重：數且神笑答！”（“小重山”）

“還自笑，人今老。

空有恨，縈懷抱。

記江湖十載，厭持旌纛。

飄落我材無所用；易除殆類無根潦！”（“滿江紅”）

“倦客新丰，貂裘弊，征塵滿目。

彈短劍，青蛇三尺，浩歌誰續？

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

嘆詩書万卷致君人，番沉陸！……

且置請纓封万户，竟須買劍酬黃犢。

嘆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滿江紅”）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襕突騎渡江初。……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

却將万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

“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永遇樂”）

第三，辛稼轩不但在其仕官期內能注意到劳动人民的生活而致力于为他们兴利除害的一些实际措施，并代替他们对于横暴的统治集团和剥削阶级提出控訴；在其作品当中，也时时流露出他对农民问题的关切。对于正在仕宦途中的友朋，他总是劝勉他们能够做体察民隐、去民疾苦的好官吏。例如为欢送郑如密去做衡州守而作的“水調歌头”中有句云：

“文字起騷雅、刀劍化耕墾。

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

莫信君門萬里，但使民歌五袴，歸詔鳳凰銜。”

如果有的朋友真地这样做到了，他便加以歌頌。例如他在送信州守王桂發离职时所作的“水調歌頭”中有句云：

“我輩情鍾休間，父老田頭說伊，淚落獨憐渠。

秋水見毛髮，千尺定無魚。”

而一般劳动人民的丰收或歉歛，愁眉或笑臉，也是稼軒所經常注意的，例如：

“父老爭言雨水勻。

眉头不似去年顰。

殷勤謝却甌中麈。”（“浣溪沙”）

第四，这才应回到本节开端处所提出的那一特点：辛稼軒不但把歌詞用以詠物、抒情，而且用以写景、敘事，用以寄感慨、發議論，而他又博學多聞，經史百家都能自由如意地驅斥在他的行間筆下。故自南宋以來雖有人批評稼軒的詞只是“詞論”，非詞家正宗，同時也就有人為他辯解，以為若不如此，而單在“風情婉嬌”方面兜圈子，“則亦不足以啓人意”^④。我們完全同意後一種意見。而且，正是因為辛稼軒开拓了歌詞的用武的領域，才使他能够異軍突起，“于翦紅刻翠之外別立一宗”的^⑤。惟其能够隨謳歌和抒寫對象之不同而可以随心所欲地運用各種歌詞的曲調，故就稼軒詞的體裁和形式而論，也都是脫落蹊徑，不主故常的，其多采多為南宋其他詞人之所不能比擬。在這裡，又可以體認出稼軒的詞在藝術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

綜括上述的幾個特點，——即辛稼軒對於祖國和中華民族的熱愛，奮鬥精神之始終昂揚，對於南宋的殘暴腐朽而又怯懦頹廢的封建統治者們的諷刺和指責，對於勞動人民生活與疾苦的關懷，樂於為人民而謳歌、代替人民提出其要求或控訴，以及其作品題材之廣闊與體裁之多種多采，更通過他的圓熟精鍊的藝術手法表達出來，——這種種條件結合在一起，自然就使得稼軒的作品充滿了生動活潑的現實內容，具有極其洪亮的聲響和充沛富足的感染力量。因

而，当稼軒在世之时，他的詞已成为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文人們詠物抒怀时爭相模拟的榜样，在他的朋輩当中，由于他的激發，也被导引出不少篇慷慨激昂的大曲和小令。对于后来的讀者，这些作品也还能發生一种振聵發聵、鼓舞战斗精神的作用。

以上所論，当然是只指稼軒作品中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而言，只指其中之足以致稼軒于不朽之域的那一部分而言，而不是說稼軒的全部作品都是合于前面列举的那些条件的。在稼軒詞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写得“情致纏綿，詞意婉約”的。这一部分，惟其符合于詞家之所謂正宗的作風，因而也就和当时一般詞人的作品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了。历来談及此事的多举稼軒“詠春”的“祝英台近”：“宝釵分，桃叶渡，煙柳暗南浦”一首为証，以为“此曲昵狎溫柔，魂銷意尽，才人伎倆真不可測”。实則属于这一类的單純抒情之作，在稼軒詞中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在范次刊印“稼軒詞”时就已在序文中說到，其中有許多是“清而丽、婉而嫵媚”的。这类作品所能說明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所謂正宗詞人的長技者，在以豪放著名的稼軒不但并不短缺，且竟是較之別人更能优为之的。然而，不論怎样，稼軒詞之所以可貴，却畢竟不在这一方面。

最后，我要引証宋人的一段筆記，通过一件故事来看辛稼軒的創作态度。在岳珂（岳飞的孙子）的“程史”中有“稼軒論詞”一条，其中記有一事說：

“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謔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座客何如，皆嘆發如出一口。

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孙仲謀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徧問客，必使摘其疵，遜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

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顧問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稼軒）詞句，脫去今古軫轍，……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

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病！’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由此可知，辛稼軒的學識儘管淵博，才氣儘管很高，而他的作品却大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工夫才得完成，並不是靈感一到即率爾操筆、一揮而就的。

- ① 見“美芹十論”中的“詳戰篇”（收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稼軒詩文抄存”中）。
- ② 見韋顧撰“南渡四將傳”中的“魏勝傳”。
- ③ 見稼軒“鷓鴣天”詞；“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襴突騎渡江初”一首及洪迈撰“稼軒記”。“稼軒記”說辛稼軒的聞關南歸，“壯聲英概，儒士为之兴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
- ④ 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中的“辛稼軒集序”。
- ⑤ 見四卷本“稼軒詞”甲集范开序。
- ⑥ 見陆游“劍南詩稿”中的“送辛稼軒殿撰造朝”詩。
- ⑦ 見刘宰“漫塘文集”中的“賀辛待制棄疾知鎮江啓”。
- ⑧ 見黃榦“勉齋集”中的“与辛稼軒侍郎書”。
- ⑨ 見稼軒“永遇樂”詞。
- ⑩ 見程迥“洛水集”（明嘉靖本）中的“丙子輪对割子”第二篇。
- ⑪ 刘过“龙洲集”中的“呈稼軒”詩有“精神此老健于虎，紅頰白鬚双眼青。未可飄泉便归去，要將九鼎重朝廷”等句，陆游“劍南詩稿”卷八十“寄趙昌甫”詩亦有“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句。
- ⑫ 見周孚“鉛刀編”中的“滁州奠枕樓記”及前引陆游詩。
- ⑬ 見崔敦禮“宮教集”中的“滁州奠枕樓記”及前引周孚文。
- ⑭ 見罗願“鄂州小集”中的“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詩。
- ⑮ 見“稼軒詩文鈔存”中的“淳熙己亥論盜賊割子”。
- ⑯ 見“宋史”中的“辛棄疾傳”及“朱子語類”中的“論民財類”。
- ⑰ 見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田賦考，五”。
- ⑱ 見罗大經“鶴林玉露”中的“辛幼安詞”条。
- ⑲ 見陈模（子宏）“怀古录”中的“論稼軒詞”条。
- ⑳ 見“四庫全書總目”詞曲类中的“稼軒詞提要”。

关汉卿和他的杂剧

王季思

一

馮雪峯先生把中国在封建时代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划分为从“詩經”时代到六朝以前、从六朝到五代、从宋到鴉片战争等三个时期。同时指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更为發展的时代，是宋代和元代及其以后，即所謂市民文学或平民文学开始有比較显著的發展的时候^①。这个时期几个偉大的平民文学的代表作者，如施耐庵、罗貫中、关汉卿、王实甫等，他們的作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曾放射出惊人的光輝，为千千万万人民所爱好。可是他們本身的事跡，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記載里，却一直是依稀彷彿，若有若無；使我們每一回翻开那些絢爛夺目的作品时，都为無法想像出这些文艺巨匠的生平与面貌而感到这是一种重大的缺陷。

今天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可以替一千多年前的李白、杜甫写成一本首尾完整、內容詳实的傳記，可以替二千多年前的屈原、司馬迁写成一篇有比較正确的历史根据的評傳。独独对于这些离开我們不过五六百年的偉大作者，却往往連他們的姓名、籍貫、生卒年岁都不容易考定。这第一是由于他們的作品主要是为一般城市平民写的，他反映了一部分人民的要求和当时历史的真实，因此这些作品在当时封建統治階級的御用文人們看来，不但毫無足取，甚至要加以“誨淫”“誨盜”的罪名^②，禁止它們的流傳。他們的事略不但見于正史，即同时人的詩文集里也很难找到有关材料。其次是他們和一般以写作“詩古文辭”为主的文人有一个不同之点，即他們的作品主要在娱乐人家，而不是表現自我。杂剧、平話不必說了，即是他們流傳下来的一些散曲，也往往是临时替勾欄里妓女写的。他們很少、甚至沒有想到利用这些文艺形式写下他們个人的生平与

抱負，这就使我們比較难于从他們的作品里考見他們的事蹟。第三是由于明清兩代印行戏曲小說的文人或書店，对于这些作家作品的不重視，常有任意刪改或冒名頂替的現象發生，因此增加我們今天整理工作上的困难。

然而畢竟今天是人民的時代，一切历史上接近人民的作家都將在这時代得到我們应有的評價和重視。因此王實甫的西廂記能在苏联莫斯科演出，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經過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实地調查也已經得到不少珍貴的史料。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这些历史上的偉大作家，他們的作品，既是直到今天还为人民所愛好；那么可以相信，他們的历史面貌，也將必然地通过今后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考索而逐漸明瞭起来的。

二

元人鍾嗣成在公元一三三〇年左右，分元代的杂剧作家为“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于世者”、“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三类，編次他們的姓名和劇目，称作录鬼簿。关汉卿列在录鬼簿里第一类的第一名，說他是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齋叟。”另外录鬼簿在梁进之名下，說他与汉卿世交。梁进之是元代散曲作家，济南杜仁傑的妹婿^①，曾任警巡院判、县尹、府判等官。汉卿既然跟他是世交，可見他的出身也一定是当时的士族。中国在北宋和宋金对峙的南宋时代，士族的子弟主要是靠科举出身。蒙古初定中原（公元一二三四年）虽曾因耶律楚材的奏請，恢复科举；但因为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对，举行了一次便停止，^②直到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一三一四年），才重行开科取士。中原士族，在这漫長的八十年間，有的学刀笔，作小吏，有的替蒙古人作僕役^③，更不幸的是左手提着灰罐，右手拿着竹枝，在有錢人的門口划字行乞^④，有点近乎后来的“告地狀”。汉卿一生有沒有經過这样的生活，虽沒有正面的資料可考；但从他所遺留下来的部分散曲、剧曲对于一些貧穷士子的同情看，可以推想他是难免經過当时一般士子所共同遭遇到的經歷的。